

欧洲视角下的“全球南方”：认知转向与战略分化

费海汀 朱江彬

内容提要：“全球南方”的崛起揭示出现有国际秩序中权力、财富和话语权的长期失衡。本文重点考察欧洲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演变及相关战略和政策的转化过程。在认知层面，殖民遗产、援助控制和欧洲中心主义延续了南北关系中的等级结构，去殖民思想和知识反思推动欧洲重新认识南方国家的政治主体性。欧洲学界主要从分析范畴、政治主体和秩序变量三个视角讨论“全球南方”议题，其中接纳性认知总体居于主导地位，批判性意见主要揭示出概念边界、内部差异和秩序方案的限度。在战略层面，防御性与修正性取向相互交织，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议题中呈现分化；国内政治、议题性质、国际形势、历史地缘条件为共同的影响因素。总体来看，欧洲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开放尚未充分转化为系统性战略调整。行动落后于认知，构成当代欧洲回应“全球南方”议题的突出特征。

关键词：欧洲 “全球南方” 后殖民主义 世界多极化 全球治理

“全球南方”既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也是一股正在形成的国际政治力量。21 世纪以来，这一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使用明显增加，其含义从宽泛的地域和发展分类逐步扩展到对权力、财富和话语权分配不均的描述。南方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借助这一称谓表达共同处境、设置国际议程和争取更大的政策空间。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和大国竞争加剧，“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国际经济和地缘

政治中的影响持续上升,逐渐成为各国学术界和战略界无法回避的议题。^①

欧洲深度参与“全球南方”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进程。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主要殖民国家先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殖民统治,改变了这些地区既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将其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欧洲学界和政界也长期围绕被殖民地区、后殖民国家的发展处境进行知识生产,相关理论和观点同“全球南方”研究形成相互关联而又彼此竞争的认知脉络。这种历史性关联,使得当代欧洲对“全球南方”议题的回应既涉及同南方国家的关系调整,也包含对自身国际位置的重新确认。

上述历史性关联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显现。俄乌冲突加重了欧洲的安全压力,欧美盟友关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欧洲在部分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也持续下降。因此,欧洲既要重新处理历史形成的不平等关系,又要回应南方国家对战略自主的要求,同时还希望扩大同南方国家的联系,为其自身安全、经济发展和全球影响力服务。对“全球南方”概念的理解和面向南方国家的战略选择,反映出欧洲在多极格局中重新确定自身位置的不断努力。

既有研究较多强调南方国家内部的不一致性,对欧洲内部复杂性的关注相对不足。实际上,欧洲各国的殖民经历、学术传统、经济联系和安全处境各不相同,对南方国家的认知和政策制定也存在明显差异。与此同时,南方国家通过提出议程、联合行动、选择合作伙伴和应对欧洲政策等方式,持续影响欧洲的认知和战略走向。

本文据此考察两个彼此联系的问题:欧洲如何调整其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方式?欧洲如何制定面向“全球南方”的行动策略?本文第一部分首先说明殖民遗产、发展援助、欧洲中心主义和去殖民反思构成的基本线索,随后从分析范畴、政治主体和秩序变量三个层面梳理欧洲的当代认知。本文第二部分考察欧洲政治界和战略界的防御性与修正性取向,分析国内政治、议题性质、国际形势、历史地缘条件对其相关选择的影响。

^① Sebastian Haug et al.,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9, 2021, pp.1923–1944.

本文认为,欧洲学界对“全球南方”的接纳性认知总体居于主导地位,批判性意见主要为概念的适用范围、南方国家的内部差异和秩序方案的边界划定。一方面,学术认知进入战略领域后,防御性与修正性取向同时出现;战略判断需要经过安全、财政、外交和行政体系,才能转化为具体政策,两道转换削弱了欧洲内部改革的范围和力度。另一方面,南北双方的互动正在明显增加,南方国家的自主行动也在不断地改变欧洲的外部条件。不过,尽管欧洲在经贸、气候环境、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同南方国家的合作,但在政治外交、安全防务、移民治理以及国际规则制定等层面,其政策取向仍更多着眼于维护自身既有的优势地位。认知逐步开放而行动相对保守,构成当代欧洲回应“全球南方”议题的中心矛盾。

一 当代欧洲对“全球南方”的认知转向

欧洲对“全球南方”概念的理解有诸多来源,各国学界的研究视角也不尽相同。德国的国家发展研究和南北关系研究的传统,为早期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反思提供了基础。以德国研究机构为支点的跨国研究把“全球南方”视为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元范畴”,重点辨析社会经济边缘性、多边联盟构建和对全球霸权力量的抵抗。西班牙和葡萄牙学者一面讨论“全球南方”概念的效力,一面借助伊比利亚美洲长期形成的历史与知识联系理解南方国家的政治诉求。意大利、北欧和中东欧的讨论相对分散,往往从欧洲内部的南方经验、发展合作、国际法、知识伙伴关系和多极秩序等问题切入。德国 21 世纪以来较为系统的概念辨析与法国 21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专题化讨论相互呼应,而法国的突出之处在于,相关概念的争论迅速进入国际关系研究、学术期刊、智库和公共讨论领域,并使这些场域之间形成密切联系。2023 年以来,法国已经成为欧洲“全球南方”概念争论较为集中的场

域,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北欧的研究则从不同方向扩展了这一议题。^①这些差异既同各国的殖民经历、区域联系和学术传统有关,也受到欧洲发展合作实践与去殖民思想传播的共同影响。

“全球南方”在现实政治和学术讨论中均被广泛使用,其含义随语境变化,也承载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欧洲学界的相关认知大体围绕三个相互衔接的问题展开:一是这一名称能否超越地理称谓,成为解释权力关系和知识生产的分析范畴;二是差异巨大的南方国家能否借此表达共同处境,在特定议题上形成联合行动;三是南方国家的行动如何改变国际制度、规范和权力关系。这三个问题分别涉及概念、政治主体和国际秩序。总体上,接纳性认知总体居于主导地位,批判性意见主要集中在概念的适用范围、南方国家的内部差异和秩序方案的边界划定。这些争论形成于欧洲与南方国家长期交往的历史之中,殖民关系的延续、发展合作的制度化、欧洲中心主义的自我复制和去殖民思想的扩散共同构成欧洲理解“全球南方”概念的重要历史与知识背景。

(一) 欧洲“全球南方”认知的历史基础

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话语演变,伴随着欧洲针对南方世界政策与认知的不断调整。其中有四条相互联系的历史线索:(1)殖民统治结束后,新殖民主义继续维持原宗主国的影响;(2)发展援助扩大了合作,也把控制机制纳入制度安

^① 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典型研究参见 Sebastian Haug et al.,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pp.1923–1944; “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GSSC),” University of Cologne, July 31, 2017, <https://gssc.uni-koeln.de/en/>; Rafael Grasa, “El Sur Global Bajo Análisis Forense: Entre Expresión Performativa, Concepto Analítico y Realidad en Construcción,” *Revista CIDOB d’Afers Internacionals*, No.139, 2025, pp.11–29; Heriberto Cairo Carou and Breno Bringel, “Articulaciones del Sur Global: Afinidad Cultural, Internacionalismo Solidario e Iberoamérica en la Globalización Contrahegemónica,” *Geopolítica(s)*, Vol.1, No.1, 2010, pp.41–63;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and Maria Paula Menese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Giving Voice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South,” in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and Maria Paula Meneses, eds., *Knowledges Born in the Struggle: Constructing the Epistemologies of the Global South*, Routledge, 2020, pp.xvii–xliii; Vincent Capdepuy, “Le Sud Global, un Nouvel Acteur de la Géopolitique Mondiale?” *Géoconfluences*, September 25, 2023, <https://geoconfluences.ens-lyon.fr/informations-scientifiques/dossiers-thematiques/inegalites/articles/sud-global>; Michel Duclos, “Le Sud Global Existe-t-il?” Institut Montaigne, October 9, 2023,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xpressions/le-sud-global-existe-t-il>.

排;(3)欧洲中心主义在知识和规范层面延续了欧洲的优越地位;(4)去殖民思想和政治运动不断挑战上述权力结构与知识秩序。四条线索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共同构建了当代欧洲的认知。

两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欧洲传统殖民大国的殖民体系,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反殖民规范和帝国危机的共同作用下,主要殖民国家先后结束了大部分正式的殖民统治。与此同时,原宗主国的影响却通过新的关系网络延续下来。法国建立的“法兰西非洲”(Françafrique)是较为典型的形态。在政治上,法国长期支持亲法政权,并借助“佛卡尔网络”(réseaux Foccart)^①及其他公共和私人关系介入部分国家的政治事务;在军事上,法国在中非和西非保持驻军或军事基地;在经济上,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由法国财政部提供兑换保证,法国还通过发展融资机构影响相关国家的经济政策。法非政治、军事、企业和地方精英由此形成相互连接的网络,法国在承认非洲政治独立和形式平等的同时,继续维持其在经济、安全和制度上的依赖。^②其他前殖民宗主国采取的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也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类似的影响机制。

发展援助使殖民体系的延续性关系获得了新的制度形式。欧洲在道义和法理上承认南方国家的独立,又以资金、技术和市场优惠支持其发展,而援助会影响受援国的发展方向和政策选择。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原先的双边联系逐渐进入共同体制度体系。从《雅温得公约》(Yaoundé Convention)到《洛美公约》(Lomé Convention),参与的国家和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贸易优惠和发展援助也逐渐增强;2000年签订的《科托努协定》(Cotonou Agreement)把消除贫困列为核心目标,同时更加重视市场改革、政治条件和治理要求。这些援助为南方国家提供了贸易和融资便利,却没有根本改变其欠发达的处境和不平等的国际地

^① Tony Chafer, “Françafrique,” in Tony Chafer and Margaret A. Majumda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Francophone Africa*, Routledge, 2023, pp.45-56.

^② “La France a-t-elle Encore un Avenir en Afrique?” Club Défense De L’Aege, May 27, 2024, <https://www.portail-ie.fr/univers/defense-industrie-de-larmement-et-renseignement/2024/chassee-de-son-pre-carre-la-france-a-t-elle-encore-un-avenir-en-afrique/>.

位。部分南方国家继续依赖少数初级产品出口,债务问题不断加重。^① 欧洲则通过制度设计、援助条件和国际规则主导权影响南方国家的发展道路。^② 合作与控制长期并存,构成欧洲对南方政策中最难消解的矛盾。

欧洲中心主义也通过知识生产和规范传播得以延续。英国学者曼纳斯(Ian Manners)提出“规范性权力欧洲”(Normative Power Europe),强调欧盟通过观念、规则和制度实践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③ 相关理论拓展了对欧洲非军事力量的认识,同时显现欧洲规范观念的内部矛盾:它既可以约束欧洲自身的行为,也可能同制裁、援助条件和现实利益结合后,转化为评价其他国家政治制度、影响其政策选择的工具。“规范性权力”概念既包含自我约束,又暗含自我优越的预设,成为欧洲中心主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表现。

拉美结构主义、依附理论和反殖民政治经济学不断从政治经济层面挑战这种等级关系。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中心与外围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拉美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将南方国家的贫困置于资本主义扩张和国际分工的场域。长期活跃于法国学术界的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进一步把南方国家的不发达理解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结果,推动欧洲知识界从南方经验出发重新思考国际经济秩序。^④ 此后的后发展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继续追问:“发展”的承诺为何长期无法兑现? 西方的发展话语怎样遮蔽对

① Omar Ali Farah, *La France, la Communauté Économique Européenne et l'Afrique Subsaharienne, de la Convention de Yaoundé (Juillet 1963) à la Convention de Lomé I (Février 197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Rennes 2, 2014, <https://tel.archives-ouvertes.fr/tel-01022946/document>;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 Brief History of 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EU and the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State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T/TXT/?uri=PI_EESC%3AEESC-2022-00344-AS.

② Daniel Bach, “Un Ancrage à la Dérive: la Convention de Lomé,” *Revue Tiers Monde*, Vol.34, No.136, 1993, pp.749-758.

③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0, No.2, 2002, pp.235-258.

④ Samir Amin, *Itinéraire Intellectuel: Regards sur le Demi-Siècle, 1945-90*, L'Harmattan, 1993.

南方国家造成的损害?^① 这些研究把南北不平等从国家发展程度的差距,推进到国际结构和知识生产的层面。

国际政治概念和政策讨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52年,法国人口学家索维(Alfred Sauvy)提出“第三世界”(Tiers monde)的概念,借用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Tiers état)的历史意象,形容那些受到忽视和剥削、要求成为政治主体的国家与人民。^② 巴兰迪耶(Georges Balandier)把这一概念引入法国社会科学,而法农(Frantz Fanon)赋予它更强的反殖民政治含义。^③ 由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主持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从政策层面分析南北相互依存,就恢复南北对话、增加发展融资和改革国际经济关系提出建议。^④ 在“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的推动下,欧洲逐渐出现一条不同于殖民控制和单向援助的思想脉络,开始承认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及其参与国际秩序改革的权利。

去殖民反思进一步进入知识生产本身。葡萄牙社会学家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提出“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ias do Sul),强调科学传统之间、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对话,反对把单一知识体系置于所有经验之上。这里的“南方”代表一种由反殖民和反支配实践形成的知识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地理归属。^⑤ 从依附与发展的反思,到历史叙事和知识体系的重构,欧洲学界逐渐出现为自身经验划定边界,让欧洲历史重回世界历史的尝试。

由此,殖民遗产、援助控制、欧洲中心主义和去殖民反思构成欧洲认识“全球

① André Gunder Frank, *Le Développement du Sous-Développement: l'Amérique Latine*, Maspero, 1969; Giovanni Arrighi, "Labour Suppl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6, No.3, 1970, pp.197-23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cademic Press, 1974.

② Alfred Sauvy, "Trois Mondes, une Planète," *L'Observateur*, No.118, August 14, 1952, p.14.

③ Frantz Fanon,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François Maspero, 1961.

④ "Brandt Commission—1977-1979,"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External Relations, World Bank Group, June 15, 1977-March 12, 1979,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252351642682030051-0560011979/original/WorldBankGroupArchivesFolder30134155.pdf>.

⑤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t al., "As Epistemologias do Sul num Mundo Fora do Mapa," *Sociologias*, Vol.18, No.43, 2016, pp.14-23.

南方”的多重历史来源。前三者延续了政治、经济 and 知识关系中的等级结构,去殖民反思则不断揭示这种结构的历史根源,推动欧洲重新认识南方国家的经验、诉求和政治能动性。面对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南方国家日益增强的自主行动力,欧洲已经走到重新界定自身位置的十字路口;如果仍以既有的权力关系和自身经验为尺度,将难以在多极格局中维持相应的影响力。延续与修正之间的张力,逐渐进入概念界定、政治主体和国际秩序等层面,构成当代欧洲认识“全球南方”的基本背景。

(二)作为分析范畴:“全球南方”的关系性与认识论边界

在历史积累和现实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南方”首先作为分析范畴进入欧洲学术讨论。它除了概括发展程度和地理位置外,也被欧洲学者用来揭示国际等级、知识生产与政治抵抗之间的联系。欧洲相关研究大多肯定这一概念的关系性和批判性价值,分歧主要在于其解释范围。此概念的不同用法导致覆盖的对象并不相同,而范围过宽又容易遮蔽各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差异。

对概念边界的辨析,有助于区分“全球南方”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根据牛津大学学者苏德(Nikita Sud)与桑切斯-安科切亚(Diego Sánchez-Ancochea)的观点,“全球南方”的常见用法可以概括为四个维度:由历史、地理和时间共同建构的地域南方;体现支配与“他者化”关系的关系南方;由欠发达和政治经济分化构成的结构南方;通过直接行动和国际团结挑战支配结构的政治南方。^①这四种用法没有清晰的先后关系,在当代学术讨论中同时存在,也经常彼此交叠:地域提供经验范围;关系和结构揭示南北差异的形成机制;政治维度说明有关行动者如何回应差异。德国的迈霍尔德(Günther Maihold)与豪格(Sebastian Haug)等学者把“全球南方”称为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元范畴”(Meta-category)。这一名称通常指向三类现象:世界经济中的边缘位置、国际组织和外交中的联合行动、对全球支配结构的抵抗。三种用法时有重合,覆盖对象和政治含义也有差别。该研究的意义在于,

^① Nikita Sud and Diego Sánchez-Ancochea, “Southern Discomfort: Interrogating the Category of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53, No.6, 2022, pp.1123-1150.

把已经广为使用的政治称谓,转化为可以分辨不同机制的概念。^①

欧洲曾经长期参与定义“南方问题”(Questione Meridionale),依附理论和后殖民研究在欧洲知识界的传播,又使得这种定义权成为反思的对象。“全球南方”所包含的批判性世界观,既涉及各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位置,又指向知识生产中的等级关系。法国学者拉瓦诺(Lorenzo Ravano)指出,21世纪以来的相关讨论越来越重视南北之间的认识论等级,追问哪些历史经验被当作一般规律,哪些知识又被排除在理论之外。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多叙事、概念和分析框架主要源自西方经验,进入南方国家的社会后,往往难以充分解释当地的制度、历史与生活经验。把过去被忽略的经验带回社会科学,有助于形成更加多元和去中心化的历史叙事。^②

关系性理解也改变了“南方”的空间含义。德国学者卡尔特(Christoph Kalter)研究法国的激进左翼时注意到,20世纪的“第三世界主义”(Third-Worldism)曾经把国际团结同对“本土第三世界”的关注联系起来,国内受压迫群体也被纳入南方政治的视野。^③这一思想脉络揭示了南北双方的彼此嵌套,反映着支配、排斥和资源分配关系的交错分布。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所处的位置可以彼此关联,同时又保留各自的历史和制度差异。

“全球南方”还带有规范层面的含义。法国学者提奥莱(Hélène Thiollet)在概述英国学者赫里尔(Andrew Hurrell)的研究时指出,新兴力量的崛起可以被理解为国际体系中一种新的规范结构。^④法国政治学家巴迪(Bertrand Badie)沿着“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ser l'Europe)的思路,主张以更加多元的世界取代单一中心的

① Sebastian Haug et al.,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pp.1923–1944.

② Lorenzo Ravano, “La Notion de Global South et l’Histoire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Crisol*, No. 16, 2021, pp.1–20.

③ Christoph Kalter, “From Global to Local and Back: The ‘Third World’ Concept and the New Radical Left in Franc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12, No.1, 2017, pp.115–136.

④ Hélène Thiollet, “Pratiques et Représentations de l’Émergence,”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No.56, 2012, pp.9–16.

解释框架,并关注规范如何在不同社会中被重新阐释。^① 巴迪将这一过程称为“意义之战”(Bataille du sens):当欧美国家难以继续垄断国际事件,关于规则正当性和秩序方向的争论也会随之加剧。^② 这些论述回应了欧洲自身的规范传统,也显示出南方国家正在进入规范生产和规则解释的过程之中。

概念的解释力也受到范围扩张的制约。“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世界多数”(World Majority)“非西方世界”等称谓时有重叠,各自强调的经济条件、政治位置和价值判断并不相同。德国的沃尔弗斯(Andrea Wolvers)等学者指出,“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会随着地缘政治环境改变,研究者对于成员范围和分析效力没有形成共识;此概念有助于揭示全球等级,也可能遮蔽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国家内部差异。将这一概念用于解释欧洲内部的南方经验,也有明显的局限性。^③ 地中海国家、中东欧或西巴尔干的边缘处境,可以用于理解欧洲内部的等级关系,但无法直接推导出它们与“全球南方”具有共同的政治身份。

术语使用上的不稳定进一步增加了厘清“全球南方”概念的困难。比利时学者珀莱(François Polet)梳理了从“南方”到“全球南方”的称谓变化,法国学者加尔桑(Thierry Garcin)注意到法语“Sud global”(全球南方)的表达习惯和概念边界仍有争议。^④ 术语使用上的差异表明,该概念尚未形成严谨、统一的定义。其在具体语境下的内涵,取决于对应的历史背景、行为主体与作用机制。经济位置、政治联合和对支配结构的抵抗时有交叠,三者不能相互替代。

① Bertrand Badie, “Le Sud global tente d’imposer son jeu,” *Les Grands Dossiers des Sciences Humaines*, No.77, 2024, pp.60–63.

② Pascal Boniface, “‘L’Heure du Sud’—4 Questions à Bertrand Badie,” Institu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IRIS), October 31, 2024, <https://www.iris-france.org/lheure-du-sud-4-questions-a-bertrand-badie-et-dominique-vidal/>.

③ A Andrea Wolvers et al., “Introduction,” in Andrea Hollington et al., eds., *Concepts of the Global South: Voi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ologne, 2015, pp.1–2.

④ François Polet, “Du ‘Sud’ au ‘Sud Global’,” *Démocratie*, No.11, 2023, pp.10–12; Thierry Garcin, “‘Sud Global’, BRICS+: Deux Notions Vraiment Géopolitiques?” *Les Analyses de Population & Avenir*, No.52, 2024, pp.2–31.

(三)作为政治主体:自我命名、联合行动与内部差异

“全球南方”作为政治主体的意义,主要来自南方国家自身的使用和行动。自我命名、议程设置和伙伴选择,使这一称谓逐渐超出外部分类的含义,并在国际会议、外交声明和议题联盟中获得政治内容。这些行动使南方国家的政治能动性在欧洲学术讨论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南方国家共同身份仍在形成,相关争论也随之集中于其稳定程度、代表资格以及成员差异对联合行动的限制。

“全球南方”进入国际政治之后,也成为南方国家表达立场和塑造共同身份的话语资源。过去,用于描述贫困、欠发达或被支配地位的许多称谓,具有较强的外部分类色彩;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跨国行动者主动使用“全球南方”,赋予它自主、团结和改革国际秩序的含义。法国学者富歇(Michel Foucher)指出,一个人怎样使用“全球南方”,往往显示出使用者自身所处的位置。^① 名称既在描述对象,也在建构对象。南方国家运用这一称谓,开始争取界定自身处境和政治目标的权利;欧洲学界对这种变化的理解,则构成其认知转向的重要部分。

既有研究注意到“全球南方”概念所具有的“表演性”,即相关政治主体主动并积极地调用“全球南方”概念,从而推动“全球南方”真正现实的塑型。法国学者马罗-贝尔纳杜(Samantha Marro-Bernadou)将这种实践概括为“标签策略”:南方国家主动调用原本带有他者化色彩的概念范畴,通过新的使用方式改变其政治含义,并把共同处境转化为议程设置的资源。^② 法国学者卡普德皮(Vincent Capdepu)和珀莱指出,当行动者以“全球南方”的名义发言时,既提出了增加话语权和国际代表性的诉求,也在推动新的政治联结。^③ 西班牙学者格拉萨(Rafael Gra-

^① Michel Foucher, “L’Ordre Qui Vient: Cinq Thèses sur le Sud Global à l’Ère Trump,” *Le Grand Continent*, March 16, 2025, <https://legrandcontinent.eu/fr/2025/03/16/lordre-qui-vient-cinq-theses-sur-le-sud-global-a-lere-trump/>.

^② Samantha Marro-Bernadou, “Le Pouvoir du ‘Sud Global’,” in Jean-Vincent Holeindre and Julian Fernandez, eds., *Annuaire français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24, Éditions Panthéon-Assas, 2024, pp.101-113.

^③ François Polet, “Du ‘Sud’ au ‘Sud Global’,” pp.10-12; Vincent Capdepu, “Le Sud Global, un Nouvel Acteur de la Géopolitique Mondiale?” <https://geoconfluences.ens-lyon.fr/informations-scientifiques/dossiers-thematiques/inegalites/articles/sud-global>.

sa)进一步将“全球南方”概括为表演性表达、分析概念和正在形成的现实。行动者使用这一名称,既在描述共同处境,也在塑造联合的范围,“南方”的边界也随之变化。^① 南方国家由此能够将他者化称谓转化为自我认同和自我赋权的资源。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经验,为“全球南方”的政治联结提供条件。西班牙学者凯罗-卡鲁(Heriberto Cairo Carou)与巴西学者布林格尔(Breno Bringel)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伊比利亚美洲的历史文化联系如何联结西班牙、葡萄牙与拉丁美洲的南方政治。殖民历史、语言网络 and 知识往来为相互理解提供渠道,但各国在发展道路和外交立场上的差异依旧存在。^② 法国外交官杜克洛(Michel Duclos)把“全球南方”视为一种主观现实,认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对西方双重标准的不满和对国际秩序的特定期待,正在形成某种“全球南方精神”(Éthos du Sud Global)。他认为南方国家没有形成统一的集团,关于共同精神的判断仍需进行更深入的经验研究。^③ 情感和历史记忆能够支持议题性联合,但其政治效果仍取决于具体利益和行动机制。

“全球南方”的身份建构仍在进行。许多南方国家反复批评殖民遗产、西方双重标准和国际制度中的代表性缺失,也在民主、发展、安全与人权等问题上强调自身经验。它们对西方制度与社会文化的态度并不一致,各国之间也不存在一套封闭、统一的价值体系。欧洲学者和政策人士对这些诉求的理解同样存在分歧。法国学者较多地从历史记忆和自主诉求层面解释南方国家的行动,德国学者更重视其战略自主性,也有国家的学者将南方动员归结为反西方情绪。这些不同解释共同构成了欧洲认知的内部张力。

外交实践使这种主体性表现得更为清晰。卡普德皮注意到,许多南方国家倾向于采取新的不结盟方式,拒绝在大国竞争中固定站队;“多向结盟”(Multi-align-

① Rafael Grasa, “El Sur Global Bajo Análisis Forense: Entre Expresión Performativa, Concepto Analítico y Realidad en Construcción,” pp.11-12, 22-23.

② Heriberto Cairo Carou and Breno Bringel, “Articulaciones del Sur Global: Afinidad Cultural, Internacionalismo Solidario e Iberoamérica en la Globalización Contrahegemónica,” pp.41-63.

③ Michel Duclos, “Le Sud Global Existe-t-il?”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xpressions/le-sud-global-existe-t-il>.

ment)强调同时发展多组关系,在不同议题上选择伙伴。^① 拉美的福廷(Carlos Fortin)等学者提出“积极不结盟”(Positive Non-Alignment),主张各国依据自身利益判断具体议题,并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主动寻找合作空间。德国学者鲁迪亚克(Marina Rudyak)指出,许多南方国家更愿意建立具体的议题联盟。她同时主张,德国若要发展平等伙伴关系,需要正视这些国家的发展诉求,并对全球治理改革和权力分享做出回应。^② 德国学者普拉格曼(Johannes Plagemann)和迈哈克(Henrik Maihack)把这种选择概括为务实的不结盟政策。平等、自主和发展机会是许多国家参与多极秩序的主要考量,它们对结成固定的反西方阵营兴趣有限,历史经验、安全环境、发展需求和对外依赖均会影响各个国家的选择。多向合作扩大了南方国家的行动空间,但也使南方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对外立场。^③

相关“全球南方”的讨论也延伸到欧洲内部的“南方经验”。拉瓦诺回顾意大利的“南方思想”(Pensiero Meridiano)时指出,“南方思想”的传统借助意大利南部和地中海的历史文化,批评欧洲内部的南北知识等级。^④ 波黑学者马伊斯托罗维奇(Danijela Majstorović)从战后和后社会主义经验出发,把波黑描述为处在欧洲边缘的社会,其边缘地位由战争破坏、转型的不确定性、外部干预和内部权力结构共同塑造。^⑤ 这些研究表明,区域边缘经验可能成为比较欧洲“南方问题”和“全球南方”概念的资源,有助于解释某些结构上的相似处境,却不足以证明相关群体具有共同的政治身份。

① Vincent Capdepu, “Le Sud Global, un Nouvel Acteur de la Géopolitique Mondiale?” <https://geoconfluences.ens-lyon.fr/informations-scientifiques/dossiers-thematiques/inegalites/articles/sud-global>.

② Carlos Fortin et al., eds., *Lat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Active Non-Alignment Option*, Anthem Press, 2023, p.4; Marina Rudyak, “Partner mit Anspruch: Deutschland und der Globale Süde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Special No.5, 2024, pp.46-51.

③ Johannes Plagemann and Henrik Maihack, *Wir Sind Nicht Alle: Der Globale Süden und die Ignoranz des Westens*, C. H. Beck, 2023, pp.11-15, 22-23.

④ Lorenzo Ravano, “La Notion de Global South et l’Histoire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pp.5-6.

⑤ Danijela Majstorović, “Postcoloniality as Peripherality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in Polina Manolova et al., eds., *From Dialogue to Practice: Pathways Towards Decoloniality in Southeast Europe*, dVERSIA, 2019, pp.131-148.

共同诉求难以消除成员之间的现实差异。提高发展中世界的代表性、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是许多南方国家都能接受的目标,但落实到贸易、发展融资、气候责任和地区冲突,各国的优先次序很快显现出差异。国家规模、经济结构、历史经验和安全环境的不同,还会进一步影响具体的选择。法国经济学家布瓦西厄(Christian de Boissieu)指出,南方与北方内部存在显著差异,对现行秩序的共同质疑无法自动消除成员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利益分歧。“全球南方”可以形成联合诉求,但难以形成成员固定、由单一国家领导的政治集团。^①

相关讨论共同勾勒出一种仍在形成的政治主体性。自我命名、议程设置、多向结盟和议题联盟体现出南方国家的政治能动性。这种主体性主要通过具体议题上的联合行动表现出来,并依靠持续的政治联结得以维持。这种政治联结能够支持共同诉求,却难以消除成员差异,也尚未形成统一的代表机制。

(四)作为秩序变量:多极化、多边主义与规范竞争

南方国家在现实政治中的行动,推动欧洲学界把讨论进一步引向国际秩序。多边制度的改革诉求、不断变化的联盟组合和日益突出的规范争论,均表明南方国家已经参与了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塑造。相较于概念边界和主体身份上的持续争论,欧洲已明确承认“全球南方”的现实影响力,相关分歧主要集中在改革方向、代表机制和南方国家能否提出较为完整的秩序方案。

秩序影响首先表现为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诉求。南方国家持续就国际组织代表性、发展融资、贸易条件、气候责任和历史不平等问题提出改革的诉求,并在具体制度的制定中争取更大的发言权。西班牙学者萨纳乌哈(José Antonio Sanahuja)将不同类型行为体的多边主义叙事概括为四种:美国推行霸权性多边主义;欧盟倡导规范性多边主义;发展中国家采取防御性多边主义;新兴国家推进修正性多边主义。南方国家的诉求因而具有多重来源,既包括历史不平等,也

^① Christian de Boissieu, “Le Sud Global et Nous,” *Les Echos*, May 14, 2024, <https://www.lesechos.fr/idees-debats/editos-analyses/le-sud-global-et-nous-2094760>; Christian de Boissieu, “La Contestation du Nord par le Sud Global et Ses Limites,”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June 20, 2025, <https://www.academieoutremer.fr/wp-content/uploads/2025/09/La-contestation-du-Nord-par-le-Sud-global-et-ses-limites-ASOM-septembre-2025.pdf>.

涉及现行制度中的利益分配。南方国家经常选择在联合国等现有机制内推动改革,并通过七十七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渠道协调立场。^①

法国相关的专题讨论较为集中地呈现了这种秩序认知。墨西哥学院学者布伦(Élodie Brun)在法国《国际关系年鉴》撰文,把“全球南方”视为一个引起讨论和争夺的概念,强调使用者的国际地位、政治语境与知识含义。马罗-贝尔纳杜则关注南方国家怎样借助这一名称表达对国际问题的不同解释,并组织联合行动。^②巴迪把南方国家的兴起置于国际体系去中心化的过程,认为过去由欧美支配的纵向关系正在受到冲击,南方国家要求建立更平等的横向关系。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帕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对巴迪的访谈,通过法国智库平台把关于意义和规范的争论引入公共讨论范畴。^③由此,相关研究把概念辨析、国家行动和国际秩序研究联系起来,呈现出学术讨论与公共讨论之间的互动。

秩序变化还表现为规范竞争。意大利学者胡贝尔(Daniela Huber)以巴以问题为例,指出一些南方国家围绕巴勒斯坦地位、国际法适用问题与西方的立场并不一致,提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规范主张。她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在多元世界中能否保持规范影响力,取决于西方是否始终遵守战后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围绕巴以问题展开的争论,使“意义之战”从概念命名延伸到国际法和规范适用领域。南方国家对现行秩序的影响不仅来自经济和人口比重的增长,也来自对规则的解释和对规则正当性的争论。欧洲所倡导的多边主义、法治和普遍规范,正受到南方国家的行动及其国际法主张的检验。^④

多极化改变了国际伙伴关系的组织方式。积极不结盟、多向结盟和议题性联

① José Antonio Sanahuja, “Narrativas del Multilateralismo: ‘Efecto Rashomon’ y Cambio de Poder,” *Revista CIDOB d’Afers Internacionals*, No.101, 2013, pp.27-54.

② Élodie Brun, “Sud (Global), un Concept Discuté et Disputé,” in Jean-Vincent Holeindre and Julian Fernandez, eds., *Annuaire français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24*, Éditions Panthéon-Assas, 2024, pp.93-100; Samantha Marro-Bernadou, “Le Pouvoir du ‘Sud Global’,” pp.101-113.

③ Pascal Boniface, “‘L’ Heure du Sud’—4 Questions à Bertrand Badie,” <https://www.iris-france.org/lheure-du-sud-4-questions-a-bertrand-badie-et-dominique-vidal/>.

④ Daniela Huber, “Israel/Palestine and the Normative Power of the ‘Global South’,” *IAI Commentaries*, No.24/14, March 2024, pp.7-8.

盟都表明,南方国家希望在大国竞争之间保留选择余地。南方国家可能在气候谈判中同欧盟合作,可能在能源、贸易或安全议题上转向其他合作伙伴,也可能借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七十七国集团和其他区域组织提出制度改革诉求。伙伴组合随议题变化,合作目标也从获取资源延伸到议程设置和规则解释。这种灵活性增强了南方国家的战略自主,同时限制了任何国家或组织长期代表整个“全球南方”的能力。法国学者泰尔特雷(Bruno Tertrais)比较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的代表性,指出这些机制的成员范围、主要职能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完整涵盖“全球南方”。相关组织成员的边界也在持续变化:阿根廷在 2023 年获邀后拒绝加入金砖国家,印度尼西亚则于 2025 年 1 月 6 日成为其正式成员;截至 2026 年,巴西、墨西哥仍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这些变化进一步表明,泰尔特雷提出的代表性问题仍然存在,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完全整合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①

代表性问题源于“全球南方”内部复杂的历史差异。德国的沃尔弗斯等学者指出,把众多国家压缩为一个整体,容易遮蔽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具体历史关系、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以及单一国家内部的财富差距。^② 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各国为何在某些议题上联合,又为何在另一些议题上分化。“全球南方”已经成为议题设置和联合行动的框架,但尚未形成能够独占其代表权的机构。南方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需要从不同的议题、组织和联盟的实际活动中进行观察。

欧洲认知的开放尚未转化为同等幅度的行动调整。欧洲政策文件越来越强调倾听、伙伴关系和共同利益;一旦改革涉及国际组织代表权、市场准入、资源加工收益或移民控制,既有的利益关联和制度惯性便会显现。丹麦学者拉斯·恩贝

^① Bruno Tertrais, “La Notion de ‘Sud Global’: Artificielle, Voire Dangereuse,” *Revue Défense Nationale*, No.866, January 2024, pp.57–62; BRICS Brazil, “Brazil Announces Indonesia as Full Member of BRICS,” January 6, 2025, <https://brics.br/en/news/brazil-announces-indonesia-as-full-member-of-brics>; BRICS Brazil,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BRICS,” <https://brics.br/en/about-the-bric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about-the-brics>; Non-Aligned Movement, “Observer Countries,” <https://www.nam.go.ug/>.

^② Andrea Wolvers et al., “Introduction,” pp.1–2.

格-佩德森(Lars Engberg-Pedersen)和拉斯穆斯·佩德森(Rasmus Hundsbaek Pedersen)指出,丹麦的伙伴关系政策仍需在价值判断、商业利益、安全目标之间权衡。^① 这表明,理解南方国家的关切只是关系调整的起点,对治理方式和利益分配的改变更为困难。

就“全球南方”自身而言,南方国家已经能够改变议程、建立联盟和参与规则争论,在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和若干安全问题上形成联合诉求,多极化也为其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南方国家提出的一些规范主张已经进入国际谈判和外交实践中。与此同时,共同诉求尚未汇合为成体系的替代秩序,成员之间对于制度改革的方式、领导权和最终目标仍有分歧。覆盖主要议题、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整体秩序方案,仍在形成中。

综上,从欧洲总体认知来看,对“全球南方”的接纳性认知居于主导地位。作为分析范畴,它被用来揭示国际权力、发展结构和知识生产中的等级关系;作为政治主体,它体现了南方国家自我命名、设置议程和灵活结盟的能力;作为秩序变量,它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重构国际多边制度的重要因素。批判性认知则揭示了对“全球南方”的三个判断边界:概念边界仍有伸缩;政治联合受到内部差异和代表性竞争的制约;秩序诉求也尚未形成完整方案。总之,欧洲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仍在逐步开放。这种认知转向进入战略和政策过程后,受到政治立场、行政体系和既有利益的筛选,其实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能否将认知上的变化转化为实际行动。

二 当代欧洲对“全球南方”的战略分化

欧洲已经较为充分地意识到“全球南方”的政治意义,但在制度改革、利益调整和权力让渡方面仍然态度谨慎。从欧洲内部看,学术认知需要经过多重筛选才

^① Lars Engberg-Pedersen and Rasmus Hundsbaek Pedersen, “Pragmatic Idealism in Danish Foreign Policy: Partnerships and the ‘Global South’,” in Cecilie Felicia Stokholm Banke et al., eds., *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24*,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4, pp.107–133.

能转化为战略和政策;从欧洲外部看,南方国家提出的议程、做出的选择及其对欧洲政策的反应,也在不断地改变欧洲的认知和行动。内部转换与外部影响相互交织,使欧洲的“全球南方”观念呈现出认知、战略与政策不同步,各国和各领域变化不一致的复杂局面。

欧洲内部的认知与行动落差,受到政治决策体系及其所处环境的结构性约束。学术认知进入政策体系大致要经过两道转换。第一道发生在研究与战略之间。有些观点主要在学术界内部传播,尚未进入决策者视野;有些专学者同特定政治力量联系密切,其建议可能因政治立场而不被采用。第二道发生在战略与政策之间。新的认知即使已经进入政府的战略表述,仍要经过安全部门、财政机构、外交官僚和既有政策工具的筛选。经过这两道转换,认知层面的开放可能受到削弱,政策覆盖的范围和改革的实际力度也会随之变化。南方国家的集体行动构成影响欧洲政策的外部因素之一。总体而言,南方国家对欧洲政策的影响主要呈现三种形态:(1)议程设置:通常由具备较强影响力的南方大国或特定议题联盟率先提出主张或议题框架,促使欧洲响应跟进或将其纳入政策视野。(2)集体反制:在欧洲提出方案后,南方各国通常以“全球南方”为着眼点,各自或集体提出批评甚至抵制,对欧洲政策形成结构性制约。(3)协商调整:在政策细化与执行阶段,由影响力较大或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或联盟出面,与欧洲围绕具体规则细节和利益分配展开磋商,从而推动欧洲政策进行有限度的妥协与调整。

在欧洲方面,法国总统非洲委员会(Conseil présidentiel pour l'Afrique)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设立该委员会,吸收来自企业、文化、教育和社会组织等领域的民间人士,希望为总统提供理解非洲的新视角,更新法国对非洲大陆的承诺。同年,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发表演讲,反省欧洲殖民犯下的罪行,并就文化交流、教育、青年流动和发展合作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2018年,法国总统府明确表示,该演讲深受法国总统非洲委员

会成员意见的影响,^①且部分建议已纳入总统的战略表述,但部分政策在进入实施阶段后却偏离了建议方向:萨赫勒地区的反恐斗争继续占据优先位置,马克龙延续了奥朗德时期的安全政策;中非法郎区国家严峻的财政状况促使法国财政部继续支持中非法郎;已经启动的发展援助改革也被法国学者戈姆(François Gaulme)评价为方向“自相矛盾”。^②

在南方国家方面,其集体行动对欧洲政策的影响正在逐渐增强,不过总体上欧洲的反应仍显迟缓。正如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前执行秘书、非盟负责对欧伙伴关系的前高级代表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所说,在“后科托努协定”时代,“协定执行效果不佳,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方面,使得维持现状变得不切实际”,但欧盟委员会谈判方仍然力图在下一阶段欧非经济合作的框架设定中“规避非盟的参与”。^③他还提及,非盟在欧洲“全球门户”计划中的参与也相当不充分。该项目启动前几周,非盟才在一次部长级会议上获知欧盟单方面宣布的与非洲有关的安排。

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使战略取向与政治行为者之间很难形成清晰的一一对应关系。欧洲内部立场多样,各国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和政策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又受到殖民历史、国家战略、对外经济依赖和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还会随着立场、议题和执政责任的变化表现出不同态度,形成多重路径和多重声音。近年来的国际动荡,进一步改变了不同力量之间的相对位

① Élysée, “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Ouverture de la 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August 29, 2017,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7/08/29/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a-l-ouverture-de-la-conference-des-ambassadeurs>; Élysée, “Discours d’Emmanuel Macron à l’Université de Ouagadougou,” November 28, 2017,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7/11/28/discours-demmanuel-macron-a-luniversite-de-ouagadougou>; Élysée, “Un An Après le Discours de Ouagadougou,” November 28, 2018,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8/11/28/un-an-apres-le-discours-de-ouagadougou>.

② François Gaulme, *Emmanuel Macron et l’Afrique. La Vision et l’Héritage*, Études de l’Ifri, January 2019, pp. 15–23,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migrated_files/documents/atoms/files/gaulme_macron_afrique_2019.pdf.

③ Carlos Lopes, *The Self-Deception Trap: Explo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Charity Dependency Within Africa-Europe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24, pp. 114–117,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57591-4>.

置。欧洲各国面对的外部压力大体相通,但做出的选择仍不一致;面对相近的南方诉求,不同国家和政治力量也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当前欧洲对“全球南方”崛起的应对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和多层次特征:一种是防御性,即将“全球南方”的崛起视为对自由主义秩序和欧洲价值体系的挑战,在地缘政治、贸易规则、发展援助和价值外交等领域采取更强硬的条件性、规范性和控制性立场,试图维持自身的制度优势和战略自主;另一种是修正性,即承认全球力量结构正在重组,尝试摆脱过度的欧洲中心主义,并以平等对话、伙伴关系、公平发展和制度改革为关键词,推动绿色转型合作、金融体系改革、债务减免和新型互联互通等议程,强调切实落实新的利益分配模式,在多边机构中让渡更多的决策代表权、提供不附带严苛排他性规则的资金条件,并在规则制定中切实保障南方国家产业升级的发展权益。两种取向在现实政策中经常相互交叠,构成若干政策组合。

(一) 防御性的欧洲与修正性的欧洲

“全球南方”已经进入欧洲的政治和战略议程,但欧洲内部仍有一部分力量对此保持明显的防御心态,更倾向于将南方国家的崛起视为挑战,或者视为需要谨慎评估、从中趋利避害的外部变化。此类观点关注自由主义秩序、欧洲价值和既有利益承受的压力,对南方国家的政治主体性及其秩序诉求保持警惕。在这一层面,仍存在与殖民话语相似的等级化表达。匈牙利学者博尼费尔特(Rita Bonifert)通过分析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话语认为,部分欧洲领导人仍会在政治话语中策略性使用殖民主义修辞,以显示自身相对于“他者”的支配地位。^①

2022年,博雷利发表关于“花园与丛林”的讲话。他把欧洲比作秩序良好的花园,把世界其余部分中的大多数称为可能侵入花园的丛林,同时承认筑墙无法保

^① Rita Bonifert, “The Global South as ‘Europe’s Jungle’: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EU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3, 2025, pp.107-128, <https://doi.org/10.51870/EMCB9028>.

护欧洲,园丁必须走向外部世界。^① 这一比喻明确划分了文明与无序的地理边界:欧洲被置于文明秩序的中心,非西方世界则成为需要防范、干预和改造的异质空间。博雷利承认隔离无法维持欧洲安全,却仍以欧洲的安全和秩序为尺度来理解外部世界。这段讲话集中呈现了欧洲政治话语中延续至今的等级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

修正性观点同样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欧洲利益面临的压力,却由此得出了不同结论。持这种观点者承认“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具有自主性的政治力量,主张与其建立更为平等的合作关系,并对欧洲与南方国家之间的既有安排做出调整。这种转型会给欧洲带来现实代价,也会触动欧洲长期拥有的制度优势,但在新的国际格局下存在必要性。

所谓“代价”,主要来自欧洲同南方国家之间长期不公正、不平等关系积累的历史责任。殖民统治、经济不平等和政策干预留下的记忆,使欧洲扩大合作时无法回避南方国家的不满与批评。法国经济学家普吕多姆(Rémy Prudhomme)以“一手拿着乞讨的碗,一手拿着燃烧瓶”形容南方国家一边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气候资金,一边批评西方的立场。^② 这一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表述把南方国家置于受援者的位置,也把它们批评归结为忘恩与敌意,彰显了援助者与受援者之间的等级关系。此类认知正是欧洲重建可信度时必须面对的障碍。另外,重要的推动因素还涉及欧洲自身的独立自主能力。欧美关系发生变化,欧洲需要寻求更广泛的伙伴组合。战略自主可以帮助欧洲减少单一依赖、扩大同南方国家的对话,也可能被用于维护欧洲的标准、市场和制度优势。修正双方关系既有助于欧洲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争取现实利益,也将影响欧洲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位置。

这种调整的必要性,来自南方国家自主能力的增强和原有合作方式的失效。

^①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uropean Diplomatic Academy: Opening Remarks by High Representative Josep Borrell,” October 13,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ropean-diplomatic-academy-opening-remarks-high-representative-josep-borrell-inauguration-pilot_en.

^② Rémy Prudhomme, “Trois cents milliards et du brouillard,” *Valeurs actuelles*, November 30, 2024, <https://www.valeursactuelles.com/clubvaleurs/monde/remy-prudhomme-trois-cents-milliards-et-du-brouillard/>.

欧盟及其成员国需要摆脱对单极世界和稳定秩序的梦想,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成为南方国家可以信赖的伙伴。欧洲即使仍希望影响南方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已经难以维持原有的伙伴关系、援助方式和规则安排。有学者指出,西方若希望继续同新兴国家合作,需要推动世界秩序改革,扩大这些国家的参与程度。^① 2022 年,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政府发起《布里奇敦倡议》(Bridgetown Initiative),提出改革特别提款权分配、引入气候灾难条款等要求,直接指向现行国际金融体系。^② 2023 年,马克龙推动在巴黎举行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Summit for a New Global Financing Pact),邀请莫特利等南方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和企业代表,共同讨论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气候融资和经济韧性。^③ 南方国家提出的改革方案由此进入欧洲推动的多边议程,欧洲也开始对这些方案做出回应。虽然回应的范围和落实程度仍然有限,但这一过程表明南方国家的倡议和自主行动正在影响欧洲的政策选择。

由此可见,防御性与修正性战略都建立在“全球南方”政治影响力上升这一判断之上。即使对南方国家持保守立场的政治人物,其批评也大多集中于概念是否有效、内部差异是否过大,已经很难否认南方国家整体地位的上升。真正的分歧在于,欧洲能否把对南方崛起的承认转化为调整自身政策的动力;欧洲究竟是继续依靠“优越与次等”的等级关系维护战略自主和全球影响,还是转向更具实质内容、更具平等色彩的互利合作。欧洲政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防御性立场仍然强于学界。影响两种战略取向的主要条件如表 1 所示。

① Anthony Dworkin,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in Flux: Strengthening European Cooperation with the Global South,”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2, 2023, <https://ecfr.eu/publication/multilateral-development-in-flux-strengthening-european-cooperation-with-the-global-south/>.

②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Barbados, *The 2022 Bridgetown Initiative for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September 23, 2022, <https://pmo.gov.bb/wp-content/uploads/2022/10/The-2022-Bridgetown-Initiative.pdf>.

③ Élysée, “Summit on a New Global Financing Pact,” June 22–23, 2023, <https://www.elysee.fr/en/emmanuel-macron/summit-on-a-new-global-financing-pact>; Lauren Ashmore, “The New Global Financing Pact: Key Takeaway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dvocates,” Donor Tracker, June 26, 2023, <https://donortracker.org/publications/new-global-financing-pact-advocate-takeaways>.

表 1 欧洲对“全球南方”战略取向的影响因素

分析层级	条件或机制	推动防御性取向的作用	推动修正性取向的作用	现有案例
国内政治	移民、安全、选举竞争和政党价值	强化控制、主权和价值条件	强调发展、公平与国际合作	勒庞、梅洛尼、马克龙、默茨、梅朗雄、科尔宾、桑切斯的主张
议题性质	安全风险、市场利益、发展目标和气候责任	推动安全化、附加条件及贸易与技术壁垒	扩大发展融资、绿色合作及知识与技术合作	马约特移民危机与法阿关系、法国气候融资、德国数字治理、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零毁林条例
国际形势及其演变	俄乌与加沙冲突、欧美关系变化、中国影响力上升	加强阵营化、价值外交和竞争性拉拢	增加务实接触、多重伙伴和制度改革需求	南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自主立场、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欧洲“第三条道路”主张
历史与地缘条件	殖民遗产、跨区域联系、经济依赖、发展合作传统和安全环境	维护既有影响范围或强化规范边界	推动桥梁角色、平等伙伴和多向外交	法国、西葡意、荷兰与丹麦、爱沙尼亚、匈牙利与塞尔维亚

注:表由作者自制。同一国家或政治人物可能同时受到多项条件的影响。

(二)国内政治与政党立场

国内政治和政党立场会直接影响欧洲国家对“全球南方”的战略取向。相较于左翼政治力量对南方问题和国际主义议题的持续关注,中间派和右翼力量的态度更加复杂。右翼力量通常更重视移民、安全和国家主权,中间派需要在开放合作、规则秩序和国内压力之间保持平衡,而左翼与社会民主力量则更关心发展援助、历史公平与和平问题。政党立场提供了观察政策差异的初步线索,执政责任、财政能力和国际环境还会影响和改变各类政治力量的具体选择。

对极右翼政治家而言,面向“全球南方”的战略高度服务于国内政治议程,尤其同移民、安全、主权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总体上带有更强的防御色彩。2017

年,法国极右翼领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访问乍得时,坚持其反对大规模移民的政策主轴,同时把相关主张表述为两大洲之间对移民流动“严格、共享和平衡的管理”。她还强调法国需要同法语非洲团结起来,以“共同的法语国家价值观”形成新的合作愿景。在强调捍卫法国主权的同时,勒庞也表达了对非洲国家主权的尊重,并提出以“合作”重新界定“援助”。^①这种表述调整了传统援助关系的叙事,却仍将限制移民和维护法国影响力置于政策中心。法国极右翼还可能通过寻求改变马克龙政府相对偏重欧洲的战略方向,重新经营法国在西非、中非、中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传统联系。在其构想中,移民控制、国家福利和法国的全球角色被纳入同一政策框架。^②

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对非政策也同国内移民议程紧密相连。作为反对派政党领袖,她以强硬的姿态讨论北非问题,执政后则使用更为温和的语言,将自己塑造为非洲同西方之间的重要对话者,并在七国集团、北约等场合强调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③意大利是北非移民进入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梅洛尼政府多次推动欧盟同突尼斯开展合作。2023年,欧盟计划为突尼斯移民治理安排的新增资金为1.05亿欧元,其中部分用于打击人口贩运和边境管理。^④合作扩大了意大利对非政策的范围,国内安全目标也被融入资金安排和项目设计程序。梅洛尼政府后续提出的“马泰计划”(Piano Mattei),进一步把移民、能源、基础设施和发展合作连接起来,显示出桥梁政策与安全诉求相互交织

① Marine Le Pen, “Discours de Marine Le Pen à N’Djaména,” Rassemblement National, March 23, 2017, <https://rassemblementnational.fr/discours/discours-de-marine-le-pen-a-ndjamena>.

② “La France, inquiète: Macron Has Only One Year to Secure His Economic and European Legacy,” Agora Strategy, October 1, 2025, <https://www.agora-strategy.com/en/post/la-france-inqui%C3%A8te-macron-has-only-one-year-to-secure-his-economic-and-european-legacy-1>.

③ Giorgia Meloni, “President Meloni’s Opening Address at the G7 Summit,” Governo Italiano, June 13, 2024, <https://www.governo.it/it/node/25987>; Giorgia Meloni, “President Meloni’s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NATO Summit in Vilnius,” Governo Italiano, July 12, 2023, <https://www.governo.it/it/node/23142>.

④ “EU Migration Support in Tunisia,”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2023, https://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c.europa.eu/system/files/2023-07/EUTF-Tunisia_v9.pdf.

的特点。^①

中间派政治家追求的政策目标更多,战略取向也更容易随议题变化。中间派通常更加信任全球化、国际合作和自由贸易体系,在加强国际合作、重建历史正义等议题上表现得较为开放。但在特定议题上,欧洲中间派既要面对极右翼势力上升带来的选举压力,又要把民主和自由价值置于外交政策的突出位置,因而也会采取明显的防御姿态。目前由中间或中右领导人执政的法德两国对欧洲一体化、国际合作和自由贸易的承诺十分清晰,但安全和价值议题受到约束。2025年,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谈及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称以色列正在“替我们所有人干脏活”。^②这表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被纳入欧洲安全利益范畴,也暴露出部分欧洲传统政治家在安全议题上的阵营立场。马克龙访问西非时,批评一些非洲国家没有坚持不侵略、尊重主权和不干涉等原则,却没有充分正视南方国家对这些原则的历史经验和政策排序。^③相较于欧洲强调的价值议题,发展往往是许多南方国家更加迫切的关切。中间派在开放合作与价值防御之间的摇摆,成为欧洲认知难以转化为行动的重要原因。

部分左翼和社会民主力量大多从发展、公平和南方国家立场解释相关问题。2025年,法国社会党主张调整主要通过贷款和投资提供的发展援助,增加用于卫生、粮食和人道主义项目的赠款与补贴,并要求欧盟预算更多地照顾最脆弱国家。该党还提出限制拨付给“全球门户”计划部分资金,把更多预算用于卫生领域和消

① Filippo Simonelli et al., “The Italy-Africa Summit 2024 and the Mattei Plan: Towards Cooperation Between Equals?” *IAI Commentaries*, March 11, 2024, pp.1-5, <https://www.iai.it/en/publications/c05/italy-africa-summit-2024-and-mattei-plan-towards-cooperation-between-equals>; Daniele Fattibene and Stefano Manservigi, “The Mattei Plan for Africa: A Turning Point for Italy’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y?” *IAI Commentaries*, March 11, 2024, pp.1-5, <https://www.iai.it/en/publications/c05/mattei-plan-africa-turning-point-italys-development-cooperation-policy>.

② “Merz: Israel Macht in Iran ‘Drecksarbeit für uns Alle’,” *ZDFheute*, June 17, 2025, <https://www.zdfheute.de/politik/g7-gipfel-merz-100.html>.

③ Jamie Shea, “Winning Back the Global South: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Friends of Europe*, 2023, <https://www.friendsofeurope.org/insights/critical-thinking-winning-back-the-global-south-difficult-but-not-impossible/>.

除饥饿。^① 这一主张直接批评了欧盟偏重投资和融资工具的合作方式,反映出左翼力量更倾向于把南方国家的基本发展需求置于欧洲产业和投资目标之前。

欧洲左翼同时也关注南方国家的和平与安全诉求。2024 年 1 月,法国左翼政治家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英国前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赴海牙,声援南非向国际法院提起的诉讼。南非在该案中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同年 5 月,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和挪威首相约翰纳斯·加尔·斯特勒(Jonas Gahr Støre)所领导的两国政府也推动本国承认巴勒斯坦国。^② 南非将加沙问题提交国际司法机构,由此,南方国家提出的国际法和公平诉求也进入欧洲国内政治议题。因此,左翼和社会民主力量为修正性政策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政治支持。

(三) 议题性质与战略取向

一国内部通常会围绕“全球南方”形成不同的声音,也会受到发声者所处位置和政治立场的影响。就一国执政者而言,其战略取向常常随着具体议题而变化。欧洲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更加重视维护其既有地位,在经贸、环保和科教领域则表现出更强的调整意愿。这种差别构成欧洲对南方国家政策最清晰的议题分界,但南方国家的倡议、批评和交涉也在不断地影响分界的具体位置。

① Olivier Faure and Dylan Boutiflat, “Aide publique au développement: le Parti socialiste soutient tous les acteurs de solidarité internationale,” Parti Socialiste, March 5, 2025, Aide publique au développement: le Parti socialiste soutient tous les acteurs de solidarité internationale-Parti Socialiste.

② Jean-Luc Mélenchon, “Communiqué: Présent à La Haye pour la Paix,” January 10, 2024, <https://melenchon.fr/2024/01/10/communique-present-a-la-haye-pour-la-paix/>; “Minister Lamola Leads South Africa’s Delegation to The Hagu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January 9, 2024, https://www.justice.gov.za/m_statements/2024/20240109-Hague.html; “Summary of the Order of 26 January 2024,”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anuary 26, 2024, <https://www.icj-cij.org/node/203454>; “Norway Recognises Palestine as a Stat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overnment of Norway, May 22, 2024, <https://www.regjeringen.no/en/whats-new/norway-recognises-palestine-as-a-state/id3040194/>; “Declaración Institucional del Presidente del Gobierno sobre el Reconocimiento del Estado de Palestina,” La Moncloa, May 28, 2024, <https://www.lamoncloa.gob.es/presidente/actividades/Paginas/2024/280524-sanchez-declaracion-estado-palestina.aspx>.

一方面,欧洲国家往往在政治、外交和安全议题上表现出防御性战略取向。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它们同原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全球地位。巴迪在接受博尼法斯采访时指出,法国的非殖民化比英国更为缓慢,并经历了至少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这一进程虽早于葡萄牙,但法国却始终未能彻底切断同原殖民地国家的恩庇关系。^① 未竟的非殖民化使法国保留了大量具有殖民时期色彩的行事方式,也使法国同南方国家之间的领土、安全和移民争议持续被纳入其维护全球地位和传统影响范围的政策之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法国为何成为政治层面上防御性战略的典型。2023年至2024年,法国海外省马约特由于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治安恶化以及水资源等公共服务紧张等原因,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引发封岛抗议。法国政府随后部署大量警力,拆除非法聚居区,推进遣返移民的“瓦姆布舒行动”(Opération Wuambushu),并讨论调整当地出生地国籍制度,希望减少非法移民动机。领土完整、国内秩序、周边人口流动和殖民时期形成的区域边界,在这一案例中集中交汇。自2024年起,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关系因西撒哈拉立场、移民遣返和法籍作家布阿莱姆·桑萨尔(Boualem Sansal)被捕等问题持续紧张。法国承认摩洛哥提出的“在摩洛哥主权下实行西撒哈拉自治”方案后,阿尔及利亚拒绝在部分遣返案件中发放领事通行证;双方随后采取收紧签证、驱逐外交人员和召回大使等措施。^② 法国在敏感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溯源至其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历史,法国国内围绕移民和法属阿尔及利亚历史的争论进一步强化了对抗性政策。马约特移民危机与法阿关系各有背景,均显示出殖民记忆、领土、安全和移民等问题如何共同

① Pascal Boniface, “‘L’Heure du Sud’—4 Questions à Bertrand Badie,” <https://www.iris-france.org/lheure-du-sud-4-questions-a-bertrand-badie-et-dominique-vidal/>.

② “Algérie: Politique et Économie,” France Diplomatie, last updated August 17, 2026,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fr/information-par-pays/algerie/politique-et-economie/>; “Visite d’État au Maroc: Deuxième Journée,” Élysée, October 29, 2024,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4/10/29/visite-detat-au-maroc-deuxieme-journee/>; “Algérie: Entretien de Christophe Lemoine,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vec France Info,” France Diplomatie, July 3, 2025,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fr/presse-et-ressources/decouvrir-et-informer/actualites/algerie-entretien-de-christophe-lemoine-porte-parole-du-ministere-de-l-europe-et-des-affaires/>.

压缩法国的政策调整空间。

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在经贸、环保和科教议题上更多地表现出修正性战略取向。法国曾经孕育“第三世界”等具有后殖民号召力的概念,这一思想传统仍在气候和发展政策中产生影响。法国参与推动《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主张改革全球金融体系,扩大公共和私人融资,使最不发达经济体能够同时应对减贫和生态转型。法国还多次在非洲举办“同一个星球”(One Planet Summit)峰会,并推动各方为萨赫勒“绿色长城”(Great Green Wall)计划筹集资金,以促进农业适应、土地修复和区域生态治理。^① 这些行动延续了法国在多边气候外交中的活跃角色,也为其对非政策提供了新的合作渠道。2009 年,发达国家集体做出每年 1000 亿美元气候融资目标的承诺,《巴黎协定》又将目标延续至 2025 年,法国全程参与和推动了相关谈判和目标落实。^②

在科技问题上,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认为,技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的交汇,正在加剧网络治理、网络外交、技术标准和全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德国需要加强国际行动,同伙伴和盟友合作,以更具包容性和民主性的方式同南方国家讨论全球数字议程;德国仍希望全球技术治理反映其技术能力、经济利益和自由民主价值。^③ 这类合作旨在扩展数字能力和规则协商,服务于德国的产业、标准和制度利益。科技合作包含伙伴关系与规范竞争,在寻求与南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扩展全球数字能力的同时,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致力于将其技术标准、经济利益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投射到全球技术治理之中。

① “L'Écologie, Combat du Siècle,” Élysée,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ecologie>; “Summit on a New Global Financing Pact,” Élysée, <https://www.elysee.fr/en/emmanuel-macron/summit-on-a-new-global-financing-pact>.

② “From Billions to Trillions: Setting a New Goal on Climate Finance,” UN Climate Change, April 29, 2024, <https://unfccc.int/news/from-billions-to-trillions-setting-a-new-goal-on-climate-finance>.

③ David Hagebölling and Tyson Barker, “Germany's Global Technology Diplomacy,” in Tyson Barker and David Hagebölling, *A German Digital Grand Strategy: Integrating Digital Technology,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imes of Geopolitical Change*, DGAP Report, No. 7, November 2022, pp. 71–81, https://dgap.org/system/files/article_pdfs/DGAP-Report-2022-07-EN_0.pdf.

尽管如此,经贸、科技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修正意愿也有着明确的界限。新冠疫情期间,2020年,印度和南非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暂时豁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部分义务,以扩大疫苗和其他抗疫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后来获得65个共同提案方的支持。欧盟没有接受原提案,而是提出一项侧重运用现有知识产权规则的替代方案,即关于疫情条件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卫生总理事会宣言草案。南非、印度、美国和欧盟随后展开高级别磋商。^①2022年,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决定,最终只对疫苗出口涉及的部分规则做出有时限的放宽,范围明显小于印度和南非最初提出的方案。^②南方国家的倡议进入国际谈判,并促使欧洲参与磋商,但欧洲仍然维护了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主体框架。

类似的脱节也存在于贸易、融资和产业合作之中。许多南方国家以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出口为主,欧洲较高的进口标准会形成隐性贸易壁垒;南方国家迫切需要的资金,在欧洲融资渠道中经常被附加严格的政治和监管条件。部分南方国家因而转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机构寻求融资。南方国家增加融资来源和合作选择,削弱了欧洲通过援助和贷款施加影响的能力,也迫使欧洲重新考虑自身的融资工具和合作条件。

生态治理中的互动更加显示出双方的争议。2019年,欧盟发布《欧洲绿色协议》(The European Green Deal),其中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把欧洲气候标准延伸到贸易领域。由于技术和财政能力有限,一些南方国家难以迅速完成绿色转型和工业设施改造,可能因额外成本而失去商品竞争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评估认为,在该协议设定的情景下,碳边境调节机制带来的全球减排幅度较小,

① “Members to Continue Discussion on Proposal for Temporary IP Waiver in Response to COVID-19,”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ecember 10, 2020,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0_e/trip_10dec20_e.htm; “Members Continue Discussions on IP COVID-19 Response as High-Level Engagement Intensifie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ecember 16, 2021,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trip_16dec21_e.htm.

②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MIN(22)/30, June 17, 2022,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2/30.pdf&Open=True>.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可能下降,贸易收益会更多转向发达国家。^① 非洲气候基金会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合发布的报告进一步指出,该机制可能对非洲出口和工业化造成较为系统的冲击,^②进一步加剧南北经济差距。

围绕欧盟《零毁林条例》(EU Deforestation Regulation)的交涉,进一步表明南方国家正在通过联合行动影响欧洲规则的实施。2023 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派出由部长带队的联合代表团赴布鲁塞尔,就棕榈油等产品出口、小农利益和供应链追溯等问题提出关切。欧盟委员会随后同两国建立联合工作组,将政府、行业协会、小农、劳工组织和社会组织纳入磋商之中,讨论供应链的可追溯性、程序透明度及国别具体差异问题。^③ 2024 年,欧盟在第三国、成员国、经营者和贸易商共同提出关切的背景下,将法规实施时间推迟一年,并在后续的修订中继续延长。^④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行动虽并未从根本上触及欧盟的核心规则,却使生产国获得了参与实施讨论的正式渠道,也影响了欧洲在这一案例中处理规则执行问题的方式。此外,2024 年举行的第 29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把发达国家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通过各种渠道筹措的年度气候融资目标提高到 2035 年的 3000 亿美元,并提出每年动员 1.3 万亿美元的更广泛目标,但其资金规模、来源

① “A European Union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CTAD, July 14, 2021,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european-union-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implications-developing-countries>.

② “Implications for African Countries of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in the EU,” African Climate Foundation and Firoz Lalji Institute for Africa an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ay 2023, pp.35-36, <https://www.lse.ac.uk/africa/assets/Documents/AFC-and-LSE-Report-Implications-for-Africa-of-a-CBAM-in-the-EU.pdf>.

③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Agree to a Joint Task Force to Implement the EU Deforestation Regul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29, 2023, 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news/european-commission-indonesia-and-malaysia-agree-joint-task-force-implement-eu-deforestation-2023-06-29_en.

④ “EU Deforestation Law: Council Formally Adopts Its One-Year Postponement,”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cember 18, 202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4/12/18/eu-deforestation-law-council-formally-adopts-its-one-year-postponement/>; “Deforestation: Council Signs Off Targeted Revision to Simplify and Postpone the Regulation,”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cember 18, 20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5/12/18/deforestation-council-signs-off-targeted-revision-to-simplify-and-postpone-the-regulation/>.

和落实方式仍受到发展中国家质疑。^①

综上,欧洲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国,在政治、外交和安全议题上仍然保持强势,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传统的行为模式,尚未出现根本转变;在经贸、环保和科教议题上,欧洲与“全球南方”的合作意愿增强和协商程序增加。南方国家提出方案使部分诉求得以进入欧洲及国际议程,跨国联合交涉推动了程序和实施方式的调整。修正性取向在后一类议题中已经形成趋势,其实际效果却不断受到国内政治、既有利益、财政能力和欧盟制度等因素的限制。欧洲政策界的行动幅度仍落后于认知层面的开放程度,认知与行动之间的脱节在此集中体现。

(四) 国际形势与战略调整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关于“全球南方”的战略视角也在发生重要转向。此前的抵制常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依赖“民主”与“威权”的二分法。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下,“全球南方”被视为人为的甚至危险的政治组合,因为它同时包含所谓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南方“民主国家”又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同“非民主国家”合作。这类论调将欧洲的政体标准作为衡量同南方国家结盟、开展合作的标尺,往往把“欧洲价值”与民主画上等号,具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与“民主至上”色彩。这种政体本位思维至今仍在影响欧洲政策。2025年,挪威政府向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合作的挪威社会组织提供超过10亿挪威克朗,把正义、民主和人权明确列为纲要性的援助目标。^②由此,价值观外交可能成为欧洲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社会与政治的重要政策工具。

近十年来,随着国际局势进一步演化和动荡,接纳性认知路径逐渐被更多政治家和战略行为体采纳,对政体本位立场的批评也随之增多。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任行长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曾把国家利益同政治体制相分离的观点称为“热

^① “COP29 UN Climate Conference Agrees to Triple Fin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UN Climate Change, November 24, 2024, <https://unfccc.int/news/cop29-un-climate-conference-agrees-to-triple-finance-to-developing-countries-protecting-lives-and>.

^② “More than NOK 1 Billion Allocated to Civil Society in the Global South,” Norad, April 25, 2025, <https://www.norad.no/en/for-partners/guides-and-tools/allocations2/funding-allocated-to-ten-organisations-more-than-nok-1-billion-allocated-to-civil-society-in-the-global-south/>.

爱人权和民主的人”所面对的危险观念,并主张当今世界真正的分界仍在于是否重视人权。^① 卡普德皮则直接批评了阿塔利对“全球南方”的轻视,认为这种态度会进一步强化南方国家对北方普遍主义的质疑。^② 这类批评反映出一种认识,即国家利益与政治体制之间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阿塔利以政体划线的二元论正是政体本位解释的体现,忽视了各国利益和政策选择的复杂性。接纳性认知以及相应的修正性战略取向不断扩大,正在动摇这种长期主导欧洲政策的单一框架。

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国际反响,成为欧洲重新认识“全球南方”的重要节点,也把相关讨论纳入国际政治的辩论。西方政策界的部分人士曾期待其“南方盟友”会在对俄问题上同自身保持一致,但这一预期很快被证明存在偏差,现实情势在某些方面甚至同其判断相反。在部分南方国家看来,俄方军事行动同西方过去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地的干预处在同一条历史线上,强国都曾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破坏既有规则,两者存在相似逻辑。^③ 这说明,当前国际分歧难以仅用“民主”与“威权”加以解释,“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在特定议题上的分歧是更加突出的政治分界线。

南方国家根据具体议题和国家利益选择立场,已经超出简单的“选边站”的模式。在联合国投票、安全合作、能源和粮食等问题上,同一国家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对欧洲而言,这种自主性意味着长期依靠援助、制度联系或政治承诺建立的南方“盟友”关系远比预想中脆弱。“全球南方”的战略重要性再次上升,并越来越从发展合作领域进入安全、外交和国际秩序领域。南方国家的自主行动开始推动国际制度中的代表权调整。非盟长期要求在二十国集团中获得正式席位。2022 年,时任非盟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Macky Sall)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欧洲理事会

① Jacques Attali, “Le ‘Sud Global’: un Concept Très Dangereux,” April 26, 2023, <https://www.attali.com/geopolitique/sud/>.

② Vincent Capdepuy, “Le Sud Global, un Nouvel Acteur de la Géopolitique Mondiale?” <https://geoconfluences.ens-lyon.fr/informations-scientifiques/dossiers-thematiques/inegalites/articles/sud-global>.

③ Joshua Askew, “Warum Unterstützt ein Großteil des Globalen Südens Russland und Nicht die Ukraine?” *Euronews*, March 29, 2023, <https://de.euronews.com/my-europe/2023/03/29/warum-unterstutzt-ein-grossteil-des-globalen-sudens-russland-und-nicht-die-ukraine>.

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随后公开表示支持。2023年,在印度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非盟正式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①这个结果来自非盟的持续推动、印度的主席国作用,以及包括欧洲在内的二十国集团成员的共同支持。非盟提出制度代表权要求,欧盟相关机构随后做出明确回应,表明南方国家的部分秩序诉求已经得到欧洲的实际支持,并纳入二十国集团代表性的调整进程。

多位欧洲政治人物的言行也体现出欧洲对“全球南方”的重新认识。2025年,德国前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提出,德国应更加尊重“全球南方”,并在原材料、移民和安全等领域采取务实行动。^②同年,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内罗毕指出,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南方”可能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方向,也应参与国际规范的形成进程。他还把气候变化、冲突、移民、技术变革、贫困列为南北双方共同面对的任务。^③2025年,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访问北京,成为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唯一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并批评欧洲各国领导人集体缺席,认为这种选择加深了欧盟的自我孤立。^④不过,也存在相反的声音。2023年,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凯瑟琳·科隆纳

① “Speech by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at the Mid-Year Coordination Meeting of the African Union,” European Council, July 18,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7/18/remarks-by-president-charles-michel-at-the-mid-year-coordination-meeting-of-the-african-union/>; *G20 New Delhi Leaders' Declaration*, G20, September 9–10, 2023, p.28, https://www.g20.org/wp-content/uploads/2024/10/G20-2023_India_Declaracao-de-Lideres.pdf.

② Tina Gerhäuser, “Kramp-Karrenbauer: ‘Mehr Respekt für den Globalen Süden’,” *Deutsche Welle*, June 13, 2025, <https://www.dw.com/de/interview-ex-verteidigungsministerin-annegret-kramp-karrenbauer-deutsche-interessen-globaler-sueden/video-72888780>.

③ “Statement b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Alexander Stubb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in Nairobi, Kenya, on 14 May 2025,”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May 14, 2025,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May 14, 2025, <https://www.presidentti.fi/en/statement-by-president-of-the-republic-of-finland-alexander-stubb-at-the-united-nations-office-in-nairobi-kenya-on-14-may-2025/>.

④ “Robert Fico: Považujem za Veľkú Chybu, že Hlavy Štátov a Premiéri Členských Štátov EÚ Odignorovali Dnešné Oslavy v Číne,” Government Office of the Slovak Republic, September 3, 2025, <https://www.vlada.gov.sk/tlacove-spravy/robert-fico-povazujem-za-velku-chybu-ze-hlavy-statov-a-premieri-clensky-ch-statov-eu-odignorovali-dnesne-oslavy-v-cine/>.

(Catherine Colonna)把“全球南方”称为错误甚至具有误导性的表达。^① 这些表态方向的差异,恰恰说明欧洲政治界已经无法回避南方国家的立场和选择。

欧美关系的变化也在推动欧洲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特朗普首次执政以来,一直质疑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并围绕贸易顺差、关税和军费分担问题向欧洲施压。而美国保护主义经贸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欧之间的产业与贸易竞争。特朗普第二次执政后,美国在“对等关税”和地区安全责任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成本,欧洲对长期依赖美国的风险有了更深的感受。法国在此背景下更加频繁地强调“欧洲主权”,主张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组合伙伴关系。2026 年,马克龙访问日本和韩国期间,倡导由欧洲、日本、韩国、加拿大、印度、巴西等愿意保持独立的国家形成合作联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避免追随美国,并将其称为“第三条道路”。^② 这一主张延续了法国的战略自主传统,也把部分南方大国纳入欧洲平衡中美关系的安排之中。

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使中国进一步成为欧洲制定对全球南方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对象。基础设施、工业发展和项目融资正是许多南方国家最重视的议题,中国在这些领域提供了具有竞争力且拥有不可替代性的政策选项。鲁迪亚克指出,中国把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置于合作中心,并提供落实项目所需的资金;对不少南方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往往是少数可行选择之一。^③ 中国认真回应了“全球南方”的发展需求和不满情绪。有学者概括中国和美国合作方式的差别:“我们同中国打交道,得到的是一座机场;同美国打交道,得到的是一场说教。”^④鲁

① Carrie Nooten and Philippe Ricard, “À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l’ONU Qui s’Ouvre à New York, le ‘Sud Global’ Incontournable et Courtisé,” *Le Monde*, September 19, 2023, https://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rticle/2023/09/19/le-sud-global-incontournable-et-courtise-a-l-onu_6190012_3210.html.

② “Déplacement en République de Corée: Deuxième Journée,” Élysée, April 3, 2026,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6/04/03/deplacement-en-republique-de-coree-deuxieme-journee>; “Déplacement au Japon: Deuxième Journée,” Élysée, April 1, 2026,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6/04/01/deplacement-au-japon-deuxieme-journee>.

③ Marina Rudyak, “Partner mit Anspruch: Deutschland und der Globale Süden,” pp.46-51.

④ Christopher Anstey, “Summers Warns US Is Getting ‘Lonely’ as Other Powers Band Together,” *Bloomberg*, April 14,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4-14/summers-warns-us-getting-lonely-as-other-powers-band-together>.

迪亚克对欧洲的分析表明,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欧洲。南方国家拥有更多的合作选择后,欧洲原有政策的局限性更加明显。欧洲正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逐渐放下对中国的偏见和对南方国家的成见,从中国同南方国家的合作中总结经验,以推动自身对南政策的更新。

(五) 战略取向的空间分布

欧洲各国的历史联系、发展水平、对外政策工具和安全处境各不相同,对南方国家诉求的理解和回应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大体形成五种取向:西欧前殖民宗主国的历史两难;南欧国家的桥梁取向;北部和西北部国家的制度本位;波罗的海及部分东欧国家的安全本位;处在欧洲内部相对边缘位置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对南方国家诉求的同情。五种取向反映了不同地区相对稳定的政策特征,具体国家仍会随着议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调整立场。这一划分标准的各选项之间存在大量重叠,本文重点论述近十年间欧洲各国在对南交往中较为突出的方面。

第一类是具有悠久殖民历史和深厚殖民遗产的西欧国家。它们往往更难在承认“全球南方”问题上完成立场转变,尽管已经在行动层面做出较多调整,但仍然面临承担历史责任与维护传统影响力的两难。其中法国最具代表性。2024年,马克龙访问印度时,批评把世界分成孤立的北方和“全球南方”的观点;^①2025年,马克龙在回应哥伦比亚总统时,反对仅仅依据南北方位理解政治现实。^②2026年,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Jean-Noël Barrot)公开宣称“不存在‘全球南方’,也不存在‘集体西方’”,把当今世界的真正分界归结为各国是否支持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又主张建立更加公正的南北关系,拒绝集团逻辑。^③这些表态承认南方国家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却拒绝接受“全球南方”作为框

^① “Visite d’État en Inde: Journée à New Delhi,” Élysée, January 26, 2024,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4/01/26/visite-detat-en-inde-journee-a-new-delhi>.

^② Moisés Ningo Daza, “Sur Global: el concepto que descolocó a Macron en debate con Gustavo Petro,” *Diario Red*, 2025, <https://www.diario-red.com/opinion/moises-ningo-daza/sur-global-concepto-que-descoloco-macron-debate-gustavo-petro/20250704120000050474.html>.

^③ Jean-Noël Barrot, “31e Conférence des Ambassadrices et des Ambassadeurs: Discours de M. Jean-Noël Barrot,” France Diplomatie, January 9, 2026,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fr/presse-et-ressources/decouvrir-et-informer/actualites/31e-conference-des-ambassadrices-et-des-ambassadeurs-discours-de-m-jean-noel-barrot>.

定法国原“势力范围”内国家的政治范畴。法国的普遍主义传统、殖民遗产和全球角色认知相互强化,使其在接纳“全球南方”时保留了更强的防御性。

第二类是在地理位置和历史交会两个维度上同南方国家关系密切的欧洲南部国家。其代表性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它们对“全球南方”的介入更为友善、积极和务实,也更愿意发挥桥梁作用。葡萄牙长期借助跨大西洋联系和对非合作经验连接布鲁塞尔与南方国家。葡萄牙学者雷蒙多(António Raimundo)研究显示,欧盟内部在围绕对非援助是否附加政治条件发生分歧时,葡萄牙通常采取谨慎和调和的立场,并借此突出其在欧洲与非洲之间的桥梁角色。^① 西班牙则依托伊比利亚美洲的历史、语言和知识网络,在欧洲、美洲和非洲之间发挥连接作用。西班牙学者西蒙(Luis Simón)认为,西班牙有志于成为欧洲争取“全球南方”的“先锋”。面对“全球南方”对传统强国言行不一的批评,桑切斯在讲话中宣称西班牙在不同地区坚持相同标准,并试图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大陆的桥梁。^② 这种桥梁角色扩大了南方国家在伊比利亚外交中的分量,也有利于提高西葡两国在欧盟内部的战略地位。意大利的桥梁角色更多经由地中海和非洲展开。梅洛尼政府启动“马泰计划”,把发展合作、教育、卫生、农业、水利、能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等纳入同一政策框架,并希望同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相互策应。2025年,在意大利南部举行的“全球南方创新”(Global South Innovation)论坛上,主办方将意大利南部和地中海定位为新全球格局中的战略枢纽,希望从这一地区探索面向“全球南方”的发展方案。^③ 欧洲南部同“全球南方”的历史和地缘联系真实存在,可

① António Raimundo, “Mapping the Agency of a Small, Former Colonial Power: Portugal and EU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15, No. 4, 2014, pp.589-605.

② Luis Simón, “¿Punta de Lanza? España, Europa y la Batalla por el Sur Global,” Real Instituto Elcano, October 27, 2023, <https://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policy-paper/punta-de-lanza-espana-europa-y-la-batalla-por-el-sur-global/>;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Government, Pedro Sánchez, at the 9th Ambassadors’ Conference,” La Moncloa, January 14, 2025, <https://www.lamoncloa.gob.es/lang/en/presidente/intervenciones/paginas/2025/20250114-ambassadors-conference-speech.aspx>.

③ “Afric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ttps://www.esteri.it/en/temi/aree_geografiche/africa/; “Global South Innovation 2025: Verso un Nuovo Modello di Sviluppo,” Global South Innovation, July 9-11, 2025, <https://www.globalsouthinnovation.com/>.

将能源安全、移民控制和国家影响力嵌入相关桥梁政策。

第三类是政局长期稳定、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北部和西北部国家,主要以荷兰、丹麦等小国为代表。它们从自身制度经验出发理解“全球南方”,在主张平等伙伴关系的同时,表现出较强的制度本位。荷兰国际事务咨询委员会(Adviesraad Internationale Vraagstukken)提出,荷兰和欧洲需要加强同南方国家的联系,增加外交、知识与文化交流投入,减少双重标准,并支持南方国家在多边机构中获得更公平的代表。该委员会同时警告,欧洲若不调整政策,可能在美中竞争和多极化进程中被边缘化。^① 拉斯·恩贝格-佩德森和拉斯穆斯·佩德森认为,丹麦政府提出的“务实理想主义”(Pragmatic Idealism)强调伙伴关系应在自由、人权、发展合作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② 稳定的国内制度和发展合作传统为这些国家采取修正性战略提供了条件。它们往往将长期稳定运行的社会模式和政治制度视为实现高水平人类发展的重要经验,并由政府在对外合作中转化为伙伴关系设计、发展合作和政策倡议中的规范参照。

第四类是直接感受到地缘安全威胁的波罗的海国家及部分东欧国家,主要以爱沙尼亚等国为代表。它们从现实安全需要出发,更强调规范边界、阵营合作和较为强硬的对俄政策,对同俄罗斯保持合作的南方国家也更容易产生疑虑,^③其战略取向具有明显的安全本位和防御色彩。爱沙尼亚前总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长期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她要求欧盟驻世界各地的外交人员,无论距离乌克兰多远,都要充分认识到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意图,继续推动制裁俄罗斯和对乌支持。^④ 卡拉斯及爱沙尼亚政府基于外交倾向形

① Adviesraad Internationale Vraagstukken, *Nederland, Europa en het Mondiale Zuiden in een Veranderende Wereldorde*, September 10, 2025, <https://www.adviesraadinternationalevraagstukken.nl/documenten/2025/09/10/nederland-europa-en-het-mondiale-zuiden>.

② Lars Engberg-Pedersen and Rasmus Hundsbæk Pedersen, “Pragmatic Idealism in Danish Foreign Policy: Partnerships and the ‘Global South’,” pp.107–133.

③ Eldar Mamedov, “Kaja Kallas’ Shocking Lack of Historical Literacy,” *Responsible Statecraft*, 2025,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kaja-kallas-history/>.

④ “EU Ambassadors Conference 2025: Opening Speech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Kaja Kallas,”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February 3, 2025,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ambassadors-conference-2025-opening-speech-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kaja-kallas_en.

成的安全判断被带入欧盟外交,影响了欧洲同南方国家讨论俄乌冲突的方式。

第五类是欧洲内部在经济水平、政治影响力和身份认同上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中东欧和东南欧部分国家。它们难以主导欧洲与“全球南方”关系的重构,却可能因为小国经验、不结盟传统和对欧洲内部等级秩序的认知,更容易认同和支持南方国家对战略自主和平等地位的诉求。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都曾参与非洲和平行动,尽管各国之间的投入规模和政策重点差异很大。^① 匈牙利更积极地接受多极世界话语,其“全球开放”“向东开放”和“向南开放”政策先后展开,对非合作、教育交流与金砖国家发展关系逐渐成为其多向外交的重要内容。^② 塞尔维亚则把南斯拉夫时期的不结盟传统、其在地缘和国内局势中的位置和面向南方国家的外交政策结合起来,以“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维持大国竞争中的政策空间。^③ 但这种接近仍有边界,各国基于安全关切和对外关系倾向做出不同的选择。

上述五种取向主要体现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在欧盟层面,成员国的选择通过欧盟内部决策机制而聚合在一起。例如,“全球门户”计划反映了欧盟对于对外政策和地缘政治考量的变化。欧盟委员会将数字、气候与能源、交通、卫生、教育与研究列为五个重点领域,提出在 2021 年至 2027 年间动员最高 3000 亿欧元投资。^④ 这一计划试图整合欧盟机构、成员国、欧洲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私人资本,减少欧洲发展融资长期存在的分散问题,以高标准、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同其他互联互通方案竞争。

“全球门户”计划同时服务于发展合作、欧洲产业和地缘竞争。2025 年,欧洲审计院报告指出,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欧盟贸易援助份额持续下降,“全球门户”

① János Besenyő, “A Visegrádi Országok Afrika-Politikája és Részvételük az Afrikai Békefenntartó Műveletekben,” *Külügyi Szemle*, Vol.19, No.1, 2020, pp.51-79.

② István Tarrósy and Dániel Solymári, “Relations with the Global South, Solidarity and Pragmatism in Hungari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1960s: A Focus on Africa,” *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13, No.1, 2022, pp.106-122.

③ Aleksandar Mitic, “Serbia and the Global South: Between Non-Alignment Policy and a Multi-Alignment Strategy,” *Romania Occidentala*, Vol.4, No.1, 2025, pp.60-71.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Global Gateway,” JOIN (2021) 30 final, December 1, 2021, https://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ec.europa.eu/system/files/2021-12/joint_communication_global_gateway.pdf.

计划强调私人融资,反而可能加大这些国家取得项目资金的难度,而欧盟现有监督体系也难以全面评估相关成效。欧盟所提供的共同融资平台扩大了资金规模和政策工具,伙伴国家参与项目设计的程度、新增资金规模和利益分配方式将决定这一平台能否实质性改变欧洲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德国政治学者赫尔特(Eugénia C. Heldt)认为,欧盟出台“全球门户”计划受到三项因素的推动:一是回应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影响力;二是发展融资转向以私人投资为重心;三是欧盟委员会在政策设计中发挥推动作用。公私合作和风险分担可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使私人资本更容易进入相关项目,但也使公共部门承担了更大风险。建设更加自主的欧洲,有助于欧盟形成较为连贯的对南政策,并减少成员国政策的分散化。有观点主张,应由欧盟及其共同机构更多地承担对南合作的协调职能,减少前殖民宗主国单独行动带来的信任赤字。^①

“全球门户”计划启动后,欧盟与非盟围绕非洲议题的协商逐步增加。2022年,欧盟与非盟峰会通过《2030年共同愿景》(Joint Vision for 2030),共同宣布总额至少1500亿欧元的“非洲—欧洲投资计划”,强调相关项目应当回应非洲国家的需要,并同非盟《2063年议程》(Agenda 2063)相衔接。欧盟在后续的实施说明中提出,由双方“共同确定”重点领域和具体项目。^②与项目启动阶段相比,非盟和非洲国家参与磋商的渠道有所增加。不过,资金动员、项目遴选、技术标准和监督体系仍主要掌握在欧盟机构、欧盟成员国及欧洲金融机构手中。南方国家参与程度

① “EU Aid for Trade to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Needs Are Being Tackled, but EU Funding Is Not on Track to Meet 2030 Target,” 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 September 16, 2025, <https://www.eca.europa.eu/EN/publications/SR-2025-17>; Eugénia C. Heldt, “Europe’s Global Gateway: A New Instrument of Geopolitic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 11, No. 4, 2023, pp. 223–234; Guillaume Duval, “Avec la Fin de ‘l’Occident’, l’Avenir de l’Europe Démocratique se Joue au Sud,” *La Grande Conversation*,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lagrandeconversation.com/monde/avec-la-fin-de-loccident-lavenir-de-leurope-democratique-se-joue-au-sud/>.

② “Sixth European Union–African Union Summit: A Joint Vision for 2030,”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18,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54412/final_declaration-en.pdf; “EU–Africa: Global Gateway Investment Packag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ec.europa.eu/policies/global-gateway/initiatives-sub-saharan-africa/eu-africa-global-gateway-investment-package_en.

的提高推动了合作程序的调整,尚未根本改变双方在议程设置和资源配置上的不对称关系。

以上案例表明,欧洲内部已经形成从防御到修正的战略演进光谱。不同地区的总体战略取向源于各自的历史联系、空间位置和现实处境,各国政策又受到国内政治、议题性质、国际形势和历史地缘条件的共同影响。南方国家提出诉求、参与磋商和选择合作伙伴,也会使这些取向发生变动。欧洲对南北对话与南北合作的关注日益增加,发展融资、伙伴关系和多边改革等领域也持续出现修正性政策。但在进入政治、外交、安全、移民和规则制定领域后,维护欧洲既有优势的力量仍然强大。接纳性认知已经深入欧洲学界和部分战略界,政策行动的调整却远未达到同等程度。认知开放与行动保守之间的落差,构成当代欧洲回应“全球南方”议题的中心矛盾,也将直接影响全球治理的转型和世界多极化的实际进程。

三 结语

欧洲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体。相比之下,“全球南方”虽然在数量上代表着世界“大多数”,但其国际影响力尚未与其总体规模相匹配。南方国家内部差异显著,难以长期“用一个声音说话”;世界话语权和制度权力仍主要掌握在少数国家或国家联合体手中;南方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整体构想也仍在形成中。不过,这种不匹配正在发生变化。南方国家已经能够围绕发展融资、气候责任、国际组织代表性和规则适用等问题改变国际议程,并通过多向合作和灵活外交扩大政策选择。欧洲既是旧有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也是南方国家推动改革时无法绕开的合作方和交涉对象。因此,欧洲与“全球南方”如何互动,已经成为重构南北关系、推动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环节。

在此背景下,本文梳理了欧洲与“全球南方”交往的历史遗产,辨析了以学术界为主的欧洲对“全球南方”的认知路径,并分析了欧洲政治和战略界的政策取向,试图回答欧洲如何认识并回应“全球南方”,以及双方关系将向何处发展。本文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欧洲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具有数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殖民统治、经济支配、发展援助中的控制逻辑和欧洲中心主义知识传统,仍在影响欧洲对南方国家的理解与政策;反殖民思想、“第三世界主义”、发展研究和知识去中心化的传统,则不断推动欧洲反思自身的位置。历史脉络延续至今,分别为接纳性与批判性认知、防御性与修正性战略提供了不同依据。在总体方向上,接纳性认知更易于与修正性战略相互呼应,但两者之间没有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欧洲学界对于“全球南方”的批判性意见主要揭示了概念边界、内部差异和秩序方案的限度;当相关批评进一步否定南方国家的政治主体性和秩序诉求时,才更容易与防御性战略结合。总体上,接纳性认知在欧洲学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欧洲对“全球南方”的回应呈现出明显的认知与行动脱节。在话语和理论层面,欧洲学界已经从分析范畴、政治主体和国际秩序三个方面推进了认知上的去中心化,接纳性认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认知开放并未充分转化为战略判断;即使进入战略层面,也难以经过行政体系大规模转化为政策实践。从学术讨论到战略判断,再从战略判断到实际政策,两道转换均削弱了欧洲内部改革的范围和力度。在实际操作中,欧洲一方面通过“全球门户”计划、气候融资改革和各类伙伴关系倡议开展务实合作;另一方面又依照价值观外交、自利性贸易安排和“规范性”使命固守传统立场。修正性行动虽然正在增加,但在政治、外交、安全、移民和国际规则制定等领域,维护欧洲既有利益和制度优势的力量仍然强大,防御性取向也因此依然突出。

第三,欧洲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和战略差异同时受到内部条件与南方国家行动的影响。国内政治、议题性质、国际形势、历史地缘条件,塑造了不同国家和政治力量的选择。西欧前殖民国家面对历史遗产与现实利益的两难;南欧国家较多采取桥梁取向;北部和西北部国家强调制度本位;波罗的海及部分东欧国家突出安全本位;中东欧和东南欧部分国家则更容易支持南方国家对平等地位和战略自主的诉求。与此同时,南方国家提出方案、联合交涉和选择其他合作伙伴的行为,也会改变欧洲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幅度。欧洲内部的复杂性与南方国家内部的差异性相互作用,使南北互动呈现多元化路径,也使欧洲难以作为高度统一的行为

体采取连贯性行动。

第四,欧洲对“全球南方”的总体立场正在转向接纳性认知和修正性战略。南方国家在国际危机中的自主选择、多极化进程的加快和欧美关系的变化,迫使欧洲重新评估既有的观念和政策。认知层面的转向已经相当明晰,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和政治人物承认南方国家具有自主界定问题、选择伙伴和参与秩序塑造的能力。战略和政策的变化相对缓慢,但仍在发展融资、绿色转型、科技合作和基础设施等领域逐步展开。欧洲正在逐渐放下对南方国家的偏见和成见,开始从中国等国家同南方国家的合作中重新理解发展需求与战略自主的重要性。这一趋势已经出现,但其推进速度和实际成效仍会受到安全焦虑、利益结构和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制约。

“全球门户”计划集中体现了欧洲政策调整的进展及其限度。自2021年以来,该计划在数字连接、绿色能源、交通、卫生、教育和科研等领域推动投资,试图把传统的发展援助模式扩展为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绿色转型的综合作框架。欧盟与非盟围绕项目设计和实施的磋商有所增加,南方国家也获得了更多表达需求的渠道。然而,“全球门户”计划仍然承担着欧洲产业发展、标准输出和地缘竞争等多重目标,资金动员、项目遴选和监督体系主要掌握在欧洲机构及金融主体手中。伙伴国家能否实质性地参与项目设计,最不发达国家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投资收益能否得到较为公平的分配,将决定这一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南北关系。

欧洲掌握着重要的资本、技术和制度资源,南方国家则通过议程设置、联合行动和伙伴选择不断改变合作条件,双方共同塑造着南北关系的未来。本文的分析表明,南北互动虽然受到历史关系、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的多重制约,但互动的范围和频率仍在持续增加,并已经在发展融资、气候治理、国际组织改革和规则实施等领域产生影响。欧洲能否把伙伴关系的叙事落实为制度改革、利益调整和权力分享,南方国家能否在内部差异中形成持续有效的议题联盟,将共同决定双方关系的走向,也将影响未来全球治理和多极秩序的实际形态。

(作者简介:费海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朱江彬,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蔡雅洁)